

政策过程的绩效损失分析*

——以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政策为例

王浙勤, 张 巍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随着经济学上由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过渡, 政策学领域也逐步引入有限理性、甚至超理性的政策理念。政策过程的供需差异是未被满足的政策需求, 分为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交流的显性差异和未发生信息交流的隐性需求, 其中隐性需求往往被忽视。政策过程的绩效损失主要来源于信息未达的沟通盲点、缺乏良好预期的沟通断点以及外在约束造成的行为偏差。通过对政策过程的绩效损失进行数理分析和实测, 提出了以下补救措施: 研制政策要科学化、规范化; 管理政策信息要专门化; 了解微观主体的行为约束, 合理设定政策目标; 提高政策受众的参与度, 下情上达。

关键词 政策; 供需差异; 有限理性; 绩效损失; 隐性需求

中图分类号: F 81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2)03-0085-06

理性的概念和方法引入政策学科, 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政策理念, 其隐含的假设包括主体知识的全面性、价值取向的中立性、占有信息的完备性等。20 世纪 40 年代著名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首次提出的“有限理性”对上述假设的真实性发出质疑^[1]。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F·A·哈耶克也曾经对古典经济学的诸多假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假设我们拥有所有相关的信息, 假设我们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偏好系统出发, 又假定我们掌握了有关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全部知识, 那么剩下的问题也就只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了。”^{[2]116} 然而, 现实是“我们必须使用的各种情势的知识, 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 而仅仅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且常常还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2]117} 在知识的自然特性面前, 即便是拥有强大权力工具的政府也不是毋庸置疑的全知全能, 政府失灵是现实存在的。Martin 最早提出政策分析在认识论上是假设, 政策假设只有通过政策实施才能验证^[3], 韩国吴锡泓等认为公共政策具有假设性, 由“如果…就会…”的方式来主张^[4], 因此, 不能先验其正确性。政策供需双方即政策部门和政策受众都是有限理性的决策主体, 均可能发生由于信

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错误信息导致的决策失误。由此出发, 本文将政策的供需差异分为显性差异与隐性差异, 以此为基础建立政策绩效偏差的分析框架, 并进一步对政策环节的偏差做出解读, 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

一、政策过程绩效损失的来源

赫伯特·西蒙在论证有限理性时, 列出了有限理性的来源: 一是行为主体的知识和信息局限, 也即信息是不完备的; 二是个体认知范围的内在约束, 也即每个决策主体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 三是规范、制度、伦理、不确定性等外在约束^[1]。这些约束使得行为人决策时不可能达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最大利益, 而采取满意原则决策。政策过程是由政策制定, 政策实施, 政策监督、控制与调整, 政策终结以及政策评估与效益等 5 个功能活动环节所组成, 涉及一系列的决策行为。Charles 指出了政策过程理性不足的多种来源: 需要决策的政策问题不是一个明确的问题、许多决策是在问题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做出的、有时政策决策是在草率、错误、肤浅或专横的判断下做出的^[5]。正因为如此, 只存在某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具有较为理想特性的政策系统, 而不存在理想的政策

收稿日期: 2011-01-19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农村中小企业支持政策的绩效评估与过程偏差”(10YJA630156)。

作者简介: 王浙勤(1970-)女,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农村中小企业管理。E-mail: wxq@mail. hzau. edu. cn

系统。依据行为主体的认知与心理状况,政策过程绩效损失的成因可以分为以下 4 个层次。

1. 政策信息未通达导致的认知盲点

信息传达包含了“传”和“达”2 层含义,就政策过程来看,实际上包含了 3 个步骤:政策的信息表达、信息传递和接收方的信息选择。首要步骤是信息的表达,也就是信息是否反映了政策主体意欲表达的问题,即政策问题的识别。政策问题的识别如同医生的诊断过程,应该是由表及里,弄清楚有机体内部不同组织的作用机理及其相互作用才可药到病除。政策问题涉及社会系统多个相互冲突的利益群体,其复杂程度远甚于此,问题的认定必然更为复杂。其次是信息传递,只有当行为者意识到了某种信息,确认自己是这一信息的接受者,并且理解了信息时,才会做出反应,交往才会发生,这是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的问题,否则就构成了政策的“认知盲点”。比如,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财政部设立创新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等 6 项专项资金予以扶持。这些政策信息是由什么部门以何种形式下达? 信息接受者——中小企业主了解信息的来源渠道吗? 他们是否了解政策的详细内容? 政策受众对政策不知情,政策效果自然无从谈起,构成政策需求方的认知盲点。由于政府部门的理性假设被取消了,认知盲点不仅存在于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信息传递,同样存在于自下而上的政策需求信息传递,也就是政策部门对政策需求是否知情呢? 如果不知情,其政策供给必然存在偏误,这是政策供给方的认知盲点,因此,政策的科学性是以民主性为前提的。最后步骤是接收方的信息选择。政府出台的基于总体判断的各种中小企业政策对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适用性,微观主体还需要对信息筛选和判断,因此政策服务不能仅仅停留于政策的传达,还应帮助业主分析判断哪些政策是本企业的相关政策,以便有效地利用政策工具。

2. 缺乏良好预期形成的信息沟通断点

信息传递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信息接收方是否能够理解传递方所意欲表达的真实意图,是否存在对政策信息的误读。如果政策的初衷是良好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政策受众不能够对政策有相应的预期,阻止了其向政策供给方传达其需求,就形成了对政策的隐性需求,对政策供给方而言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至少存在以下两个因素阻碍了良好预期的产生,其一是信息载体本身的局限。政策学家叶海卡

· 德罗尔批判由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过于狭窄,只考察了人类具有的多方面推理能力和推理无能中的一部分,并提出了“精神理智”概念,“精神理智”概念本质上具备超理性的素质,如不言而喻的模式识别、想象、灵感、创造力、不同形式的直觉等精神层面难以言传的因素也会影响决策^[6]。正如著名的哲学命题所言“我们所知道的大于我们所讲出来的东西”,至少二者是不对等的^[7]。正因为如此,政策传达所依附的语言、符号载体虽提高了知识传播的效率,却承载有限,被赋形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只传播形式,许多要求的量化说明超出现有的概念和尺度的能力范围,不能表达执政者的意志力、个人魅力等对政策效果存在重大影响的意识形态因素,我国封建社会所谓“圣意难猜”之说情同此理。其二是信息接收方以往的经验依赖。生理学家们将刺激分为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外部刺激有外部环境产生的感觉能,内部刺激则有内部环境产生的感觉能,任何外在的信号刺激都要内化到生物体的神经系统而后产生反应行为。每一个生物体的内在环境都不同,这种反应必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固定,神经经济学家研究认为内部刺激与环境 and 生物体的生物力学状态有关。比如,在农民申请信用社贷款时如果认为“信用社贷款要熟人关系”“放贷额度太低,手续太繁琐”,因此,对于大多数业主即使了解融资政策,也达到了融资条件却宁愿放弃正式金融渠道而选择非正式金融。而这种认识的形成基于或是自身或是周围人的类似经历,这种经历形成了惯性很强的融资渠道选择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新的资金支持政策效用的发挥,除非有相反经历发生。

3. 政策困境及相关的行为偏差

行为人有共享的信息和共同的预期,是否就一定会促使“政策交易”的发生呢? 任何政策设计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然而行为与意念之间总有着无法弥合的鸿沟。其一是政策困境问题。现实世界是各种复杂关系互相嵌入的、不可分离的、矛盾的统一体,政策干预难免顾此失彼。比如中小企业支持问题,主张直接扶持者认为政府应该在研究调查中小企业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予以资金、技术等资源方面支持;主张间接扶持者比如财政部李全研究员认为直接扶持救急不治本,中小企业量多面广,直接扶持覆盖面小,对于中小企业更适合于制度与环境等间接扶持^[8]。其二是政策的滞后性问题。既然政策是人

类的计划活动,是对现实问题反应之后的应对,所谓的最佳分配方案不可能事先预知,而历史比较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政策必然存在滞后性,即计划赶不上变化,其现实适宜性必然是相对的。

除了以上来自行为选择的认知障碍外,还存在来自外部世界的行为障碍,同样会抑制政策供给行为,我们称之为政策成本。政策成本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一,旧政策的拆除成本。由于新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利益格局的重构,因此,可能引发利益既得者的抵制行为,并可能因此而带来大量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严重时可能使“政策交易”不能发生。其二,新政策的行为成本。从政策过程来看,类似于契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政策过程涉及信息的搜寻、政策的设计、执行、反馈、协调等一系列行为成本,这些行为本身的内在逻辑关系,使得行为偏差具有传递性。信息搜寻不足可能会使政策设计无效,而政策设计一旦完成,政策的执行、反馈、协调成本就大致确定,所以行为成本对政策供给有直接影响。其三,分摊到各相关行为主体的成本。水平方向上正如叶海卡·德罗尔分析政策的无能时指出:“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直接相关的结构和过程存在内部紧张关系,以致削弱了组织的行动能力”^[6]。垂直方向上政策过程也往往需经由多对委托代理关系才能最终抵达政策受众,分散在各环节的成本过高也可能抑制政策供给的发生。此外,政策的有效实施还必须考虑政策的最终环节——政策受众的成本承担能力,过高的行为成本再加上认知上的惯性和行为上的惰性也会抑制需求行为发生。

4. 政策供给不足导致的显性供需差异

当政策需求的一方向政策供给方提出了要求,双方便进入了“交易”状态,供给方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配给,配给的结果是可能有一部分需求者无法完全或者部分得到满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一向众口难调,正如叶海卡·德罗尔所言“雄心勃勃的政策制定常常必须在一片薄薄的剃刀口上行走,刀口一侧的下面是狂热主义和直接控制的陷阱,另一侧的下面是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坟墓。”^[6]由于利益的多元性、相关者参与程度的差异性、可支配资源(包括智力资源)的有限性、权力范围的特定性、组织内部掣肘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等约束,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机构其能力都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必然存在政策部门力不能及的领域,政策需求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换言

之,政策的均衡永远也无法实现。此外,当存在政策组合时,“在不同的条件下各种质的改进的重要程度可能不同,而同时进行的多方面改进的组合,有可能导致积极的相互作用,也有可能导致消极的相互作用。”^[6]也就是政策组合的合力作用有可能会减低单项政策的作用效果,预期的政策假设不能完全实现。

二、政策过程绩效损失的数理分析

为了便于数理逻辑的演绎,我们假定:(1)政府部门的政策供给意愿是完全的,不存在包括自身利益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干扰。(2)不考虑大众行为的顽固特征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如感情主义倾向,易于受象征性操纵的影响。政策过程双方认知盲点、沟通断点、行为偏差、供需偏差引起的4个层次的绩效损失中的前3个层次中由于供需双方未进行实质性信息交流,称之为隐性绩效损失,只有第4个层次的损失才被行为揭示,称之为显性绩效损失,前一个层次的政策绩效损失会传递到后一个层次。各层次的绩效损失以政策受众的人数比例测度如下:

①如果存在政策需求的人数总体为 N ,比例为1;则了解政策的人数为 n_1 ,比例为 Pn_1 ($Pn_1 = n_1/N$),对政策“无知”的人数为 n'_1 ,比例为 Pn'_1 ($Pn'_1 = n'_1/N$);

②在了解政策的人群中,对政策有良好认知和预期的人数为 n_2 ,比例为 $Pn_2 = Pn_1P(n_2 | n_1) = n_2/n_1 \cdot n_1/N = n_2/N$,没有良好认知和预期的人数为 n'_2 ,比例为 $Pn'_2 = Pn_1P(n'_2 | n_1) = n'_2/n_1 \cdot n_1/N = n'_2/N$;

③在对政策存有良好预期的人群中,采取行动的人数为 n_3 ,比例为 $Pn_3 = Pn_2Pn_1P(n_3 | n_2) = n_3/n_2 \cdot n_2/n_1 \cdot n_1/N = n_3/N$,没有采取行动的人数为 n'_3 ,比例为 $Pn'_3 = Pn_2Pn_1P(n'_3 | n_2) = n'_3/n_2 \cdot n_2/n_1 \cdot n_1/N = n'_3/N$;

④在采取行动的人群中,需求得到满足的实际人数为 n_4 ,比例为 $Pn_4 = Pn_3Pn_2Pn_1P(n_4 | n_3) = n_4/n_3 \cdot n_3/n_2 \cdot n_2/n_1 \cdot n_1/N = n_4/N$,没有得到满足的实际人数为 n'_4 ,比例为 $Pn'_4 = Pn_3Pn_2Pn_1P(n'_4 | n_3) = n'_4/n_3 \cdot n_3/n_2 \cdot n_2/n_1 \cdot n_1/N = n'_4/N$ 。

由于绩效损失只有在需求方采取行动时才被揭示,故进入信息交流环节的人数为 n_3 ,需求得到满足的人数为 n_4 ,比例为 n_4/n_3 ,未满足需求的人数为 n'_4 ,比例为 n'_4/n_3 。实际上未被满足的需求人数为 $N - n_4$,二者之差 $N - n_4 - n'_4 = N - n_3$ 即为隐性绩

效损失,也即全部需求主体中未采取行动者。

同理,对于政策供给只有在存在信息交流环节的绩效损失时才是显性的,而之前的各个环节均存在政策供给的隐性绩效损失。我们作出如下假定:政府部门对企业诉求的了解程度为 P_{S_1} ,不了解程度为 $1 - P_{S_1}$;政策设计的合理程度为 P_{S_2} ,不合理程度为 $1 - P_{S_2}$;政策执行程度为 P_{S_3} ,未执行程度为 $1 - P_{S_3}$;政策需求的满足程度为 P_{S_4} ,未满足程度为 $1 - P_{S_4}$ 。政策部门所掌握的需求满足程度为 P_{S_4} ,而实际的满足程度为 $P_{S_1}P_{S_2}P_{S_3}P_{S_4}$,由于信息不畅或政治成本导致的隐性供给不足为 $P_{S_4} - P_{S_1}P_{S_2}P_{S_3}P_{S_4}$ 。

为了更好地了解供需双方行为过程政策绩效损失,请看下面的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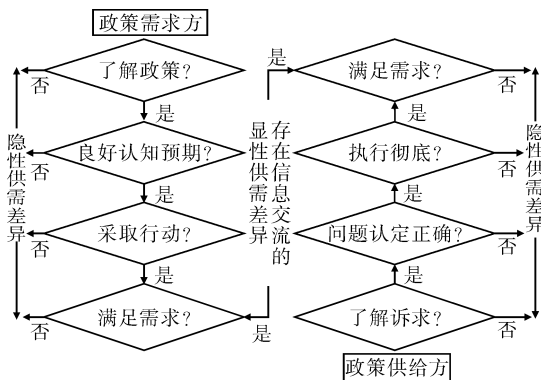


图 1 供需双方行为过程政策绩效损失示意图

三、政策过程绩效损失实测:以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为例

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基本状况是一方面吸纳了

大量的存款,另一方面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2009年1月我们的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9个省份进行了农村中小企业支持政策调查,有效问卷总数为604份,调查显示农村企业主有着强烈的融资需求,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采取家庭积累或亲朋借贷等非正式融资渠道,创业初期从正式金融机构融资比例仅为13%。在我们的走访中,农村企业主对此代表性的说法有“手续太麻烦,就几千块,找村里人借很简单”“除非规模大一点,最少要50万资产规模,或者说是特困户,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小个体银行不会给(贷款)”“找银行?还要找熟人,请客吃饭太麻烦。”;而农信社认为“对农民的贷款政策很宽松,只要没有以前的欠款,都可以贷。”“贷款获得率是80%~90%”。农村金融供需两旺与两难并存,双方的供需差异是如何产生的?通过调查我们筛选出了与农村金融的认知与行为相关的问题(见表1),然后依据问题与理论框架的对应关系,运用Excel统计软件将调查数据逐步筛选后整理为表2。

表 1 政策需求调查

| 主要相关问题及筛选办法 | 是 | 否 |
|---|---|---|
| 1. 企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查看是否选择资金) | | |
| 2. 政府近2年是否有融资支持政策? | | |
| 3. 你认为哪些优惠政策有益于你的创业?(查看是否选择信贷政策) | | |
| 4. 你是否向银行或信用社提出过贷款申请? | | |
| 5. 你的资金来源有哪些?(查看是否取得银行或信用社贷款) | | |
| 6. (1)你认为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2)如果金融机构的贷款方便而快捷,你是否会首选? | | |

表 2 调查结果统计

| 概率 | 是否知情 | | 是否有良好预期 | | 是否提出过申请 | | 是否得到贷款 | |
|------|-----------|------------|--------------|---------------|--------------|---------------|--------------|---------------|
| | P_{n_1} | $P_{n'_1}$ | $P(n_2 n_1)$ | $P(n'_2 n_1)$ | $P(n_3 n_2)$ | $P(n'_3 n_2)$ | $P(n_4 n_3)$ | $P(n'_4 n_3)$ |
| 人数 | 354 | 40 | 175 | 179 | 109 | 66 | 87 | 22 |
| 比例/% | 90 | 10 | 49 | 51 | 62 | 38 | 80 | 20 |

表 2 显示,在提出的借贷申请中约有 80% 得到了批准,然而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创业者向金融机构提出了申请,604 名受访者中存在融资需求的人数 N 为 394,其中只有 n_4 即 87 人实际得到了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占全部融资主体的比例为 22%,即实际未满足需求的人数为 $N - n_4$ 即 307 人,比例为 78%。由于向金融机构提出过申请的人 n_3 仅有 109 人,因此,金融机构档案资料显示的未满足需求人数 n'_4 为 22 人,比例为 20%,显然夸大了供给满足率。307 人的

需求未被揭示,此部分的供求差异即隐性差异的实际意义在于意味着此部分是尚未被开发的潜在市场。

长期来看,行为与认知存在交互性,我们又对贷款经历和贷款意愿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有贷款经历的人更愿意向银行贷款,具有统计显著性,反映了需求主体的认知与行为之间存在自洽性,也说明资金获取途径上具有路径依赖。进一步,贷款经历是否会影响对贷款障碍的认知?表 3、表 4 交互统计显示,无论是否有过银行贷款经历,“手续麻烦”

都被选为最大障碍,而第二诉求有所不同,无贷款经历的人认为是“无财产抵押”,贷过款的人选择“金额太低”,也即如果将供给不足计算在内,则供需差异会进一步扩大。可见,认知与行为之间存在相互

构建性,政策部门加强政策的有效供给会提高政策受众的良好预期。对于政策供给方认知或行为偏差造成的供需差异由于调查成本所限,我们仅做了理论上的演绎。

表3 贷款经历与贷款意愿

| 贷款意愿 | 有贷款经历/人(占比/%) | 没有贷款经历/人(占比/%) | 拒绝回答/人(占比/%) | 合计/人 |
|------|---------------|----------------|--------------|------|
| 愿意 | 135(57.20) | 146(42.44) | 3(12.5) | 284 |
| 不愿意 | 51(21.61) | 107(31.11) | 4(16.67) | 162 |
| 拒绝回答 | 50(21.19) | 91(26.45) | 17(70.83) | 158 |
| 合计 | 236(100) | 344(100) | 24(100) | 604 |

非参数检验 Pearson Chi-Square=39.039,对应 P=0.000

表4 贷款经历与贷款障碍认知

| 贷款障碍认知 | 有贷款经历/人 | 没有贷款经历/人 | 拒绝回答/人 | 合计/人 |
|--------|----------|-----------|--------|------|
| 手续麻烦 | 77(第1诉求) | 118(第1诉求) | 4 | 179 |
| 无财产抵押 | 49(第3诉求) | 103(第2诉求) | 6 | 158 |
| 金额太低 | 66(第2诉求) | 45(第3诉求) | 1 | 112 |

四、政策过程绩效损失的补救策略

虽然意识形态、信息传达、沟通、政策成本等都会妨碍政策供求信息的传递,政策部门不能幸免于理性能力的约束,但拥有着公共管理权利和义务的政府部门,由于广阔的视野和对狭隘部门利益的超越,可以立足长远。而且,由于其拥有强大的权利工具,在社会网络中的知识分布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可以拥有或比较容易地拥有他人信息集和社会信息集。因此,政策部门可以补救政策过程的绩效损失。

1. 研制政策要科学化、规范化

事实上,我国公共政策领域已经历了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向主动理性构建阶段的转变,政策分析及其基础理论研究将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时期^[9]。我国当前的目标是建立高效的、资源节约型政府,在我国的政策理论和实践中包括政策问题的认定、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假设的提出、执行过程的监督、政策分析方法和政策绩效的评价等都亟需加强。

2. 管理政策信息要专门化

调查发现,有很多研究所需的基础数据相关部门无法提供,暴露出了相关政府部门基础统计数据的采集、分类、管理和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信息是任何决策的首要问题,在政策制订、论证、决策、执行、监测等环节存在着大量的政策信息,对这些信息的采集和利用不仅可以及时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也为今后政策的制定提供前车之鉴。相关政府部门理应建设性地加强政策信息管理,只有充分地占有信息,并从信息

的来源、形式、特点等全方位把握,才有可能去伪存真,甄别信息含有的偏差,提高政策水平。

3. 了解微观主体的行为约束,合理设定政策目标

政策是一种人造秩序,是对社会秩序的重构。长期以来,我国政策部门习惯于自上而下地进行整体社会秩序的构建,而较容易忽视微观主体的行为反映,导致许多矛盾产生。比如,增加企业就业人数与企业增加成本的矛盾,农村金融机构对弱势群体信贷支持与自身经营目标的矛盾等。不了解微观主体的行为约束,政策目标与微观主体目标不一致就难以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

4. 提高政策受众的参与度,下情上达

我国当前的政府治理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运行体制,单一的信息通道对决策者的理性能力形成了很大制约,其弊端正如经贸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农村政策评估:中国》中所指出的那样“问责程度低,因为政府结构往往尚不完善,依靠自上而下的机制,尚不足以有效地监控、评估政策”^[10]。政策供需差异揭示的总体策略应该是构建某些制度或程序以充分发现散布于社会的各种决策相关信息,在政策的设计、决策、执行的全过程对政策相关群体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避免片面性和主观臆断,比如,建立实时的政策效果跟踪和定期回访制度、政策听证制度等克服政策过程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参 考 文 献

[1] [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M].第4版.詹正茂,译.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5-57.
- [2] [英]F·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16-117.
- [3] MARTIN L. The proper domain of policy analysi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77,21(4):115-121.
- [4] [韩]吴锡泓,金荣枰.政策学的主要理论[M].金东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5] CHARLES E L. Policy analy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48(3):58-65.
- [6] [以]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传,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20-125.
- [7] [美]罗伯特·克朗.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M].陈东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
- [8] 中国经济网,经济参考报.国家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正在酝酿 多部门密集调研[N/OL].(2009-06-29 [2011-01-05]).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906/29/t20090629_19417415_1.shtml.
- [9] 米加宁,王启新.面向对象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J].公共管理学报,2009,6(1):13-25.
- [10] 经贸合作与发展组织.农村政策评估:中国[EB/OL].(2010-11-23) [2011-01-02]. <http://wenku.baidu.com/view/61edbe7302768e9951e738e4.html>.

Analysis on Performance Loss during Policy-making Process

—A Case Study of Rural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Financing Policy

WANG Xi-qin,ZHANG We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Since the evolution of rationality from complete rationality to bounded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some new concepts including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super-rationality were also introduced into policy area.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involves both apparent and hidden demand and the latter is always ignored. The performance loss during policy making process come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blind point from scarcity of communication, break point from lack of nice prospective and action deviation associated with external restri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measure of performance loss in policy-making proces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methods to remedy the loss: research and making on policy should be finished in scientific and standard way; information on management policy should be specialized; the behaviour restraint of micro-subject should be known and the policy object should be rationally established; the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making should be widely spread so that the information can be passed from down to up.

Key words policy; discrepancy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bounded rationality; performance loss; hidden demand

(责任编辑:刘少雷)